

大晟应钟：袅袅余音九百年

台传媒记者吴世渊 实习生何沁茹

鼓腹、圆筒、双夔龙钮，通体云雷纹和乳钉纹，这似乎是一件先秦时期的青铜乐器。

然而，正面镌刻的“大晟”二字，以及背面刻的音律名“应钟”，表明了它的真实身份：这是由北宋最高音乐机构——大晟府出品的乐器，是标准的“北宋制造”。

这件北宋大晟应钟铜编钟，来头可不小。它由宋徽宗下令铸造，与当时复兴雅乐的改革息息相关。如今，它藏于临海市博物馆，当研究人员用木槌轻轻敲击钟身，袅袅余音仿佛穿越了900年光阴。

北宋崇宁三年(1104)十月，应天府(今河南商丘)崇福寺里，有一项重要的考古发现，僧人在地里挖出了春秋时期的六枚古钟，上刻铭文：“宋公戌之调钟”。

应天府，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福地——黄袍加身之前，他的官职是后周归德军节度使，治宋州，故而登基后取宋为国号。宋州也改名为应天府，意思是“应天”之命。

在受命之邦，挖出了带有皇朝国号的古器，举朝都认为这是祥瑞。宋徽宗便下令，召集全国能工巧匠，选取精铜，根据“宋公戌”样式仿制一套编钟，再现上古雅乐。

中国古代音乐史上，最繁盛的时期是唐代。自安史之乱后，国力日渐衰微，再经五代十国的分裂、战乱，音乐活动变得支离破碎，宫廷的乐器、乐工也“十不存一”。

宋朝建立后，想恢复礼乐制度，在国家祭祀大典、朝会上演奏雅乐，以显示庄严肃穆。但音乐人才的断档、乐曲技艺的失传，让这项制度推行起来十分困难。从太祖赵匡胤开始，到哲宗赵煦，宋廷有过5次乐制改革，都称不上成功。

崇宁元年(1102)，宋徽宗赵佶即位。这个治国理政无能、文艺天赋非凡的君主，又命群臣议乐。据《宋史·乐志》记载，与会者们说：“大乐之制，讹谬残阙，太常乐器弊坏，琴瑟制度参差不同，箫笛之属乐工自备，每大合乐，声韵淆杂，而皆失之太高。”可见当时的宫廷音乐已经不成体系，非整顿不可了。

“宋公戌之调钟”的出土，成为了乐制改革的契机。古钟外形容易模仿，制造技术却难以复原。先秦的编钟，从小到大，一口钟能发出两个音。宋代的编钟，大小一致，厚薄不同，每口钟只能发出一个乐律的音。

中国古代音乐中，使用了十二个绝对音高，称为十二律。十二个音分别为：黄钟、大吕、太簇、夹钟、姑洗、中吕、蕤宾、林钟、夷则、南吕、无射、应钟。其中，黄钟为基准音，相当于现代乐理的C音。可世事变迁，黄钟的音高，到底是自然界中哪个音，早已无法确定。为此，朝廷在民间搜求“知音”人士。

有个叫魏汉津的西蜀人，九十多岁了，自称学过鼎乐之法。他被人推荐到宫廷，与大司乐刘曷一起制定了黄钟的标准，按照这个标准音，再来制造编钟。

崇宁四年(1105)八月，编钟乐器制造完成。按照当时的礼



制，新钟共有十二编，每编二十八枚，包括正声钟十二枚、中声钟十二枚、清声钟四枚，共336枚。这套乐器搬到崇政殿上的“首演”，果然“八音克谐，不相夺伦”。

九月，宋徽宗与文武百官到大庆殿庆祝乐器落成。当音乐响起时，竟然有十只白鹤飞来，在大殿上空盘旋。徽宗大悦，表示：既然尧乐称“大章”，舜乐称“大韶”，那么今天我们的音乐就称之为“大晟”。于是，新乐编钟也被称为大晟钟。

大晟钟既是宫廷乐器，也成为了“校音器”。徽宗命人将这些钟发往全国各州(府)，作为标准音律，为其他乐器“校音”。这样一来，同一首曲子在其他地方演奏，就不会跑调了。

从今天的眼光来看，宋代的音乐人、工匠在没有现代精密仪器的条件下，能将大晟钟做出如此效果，说明北宋的音乐艺术和铸造技术，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。甚至可以推想，在当时的音乐实践中，人们已经掌握了十二平均律(将一个八度的音程，等分成十二个半音的律制)。而真正将十二平均律律制以数学概念计算，要等到480年以后，由明朝皇子朱载堉完成。

大晟钟的“晟”字，有光明、兴盛之意，大抵宋徽宗希望国家能繁荣昌盛，四海弦歌。

然而，历史的走向，并不以某人的意志而转移。在大晟钟铸造完成的22年后，靖康之变，汴京沦陷，徽、钦二帝被金兵掳去了北方。与此同时，“凡大乐轩架、乐舞图、舜文二琴、教坊乐器、乐书、乐章、明堂布政图月体式、景阳钟并虞、九鼎皆亡”。

336枚大晟钟，有的被宋人埋于汴梁城下，有的被金人掳掠北上，有的散失于民间，也有的随宋室南渡到了江南。

被掠到北方的大晟钟，继续在金国的宫廷里演奏。为了避讳金太宗完颜晟的名字，金人将钟上



顶部饰夔龙钮 杨辉摄

的“大晟”磨去，重刻了“大和”二字。元明时期，这些编钟依然被宫廷使用。到了乾隆年间，梁正等奉命将官中所藏古铜器编篡成书，发现了4件刻有“大和”的编钟，他们不知其来历，以为是周代乐器，就编入了《西清古鉴》及《西清续鉴乙编》中。民国时，其中2件被运往台湾，今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，另2件下落不明。

更多大晟钟离散到天涯海角。本世纪初，武汉音乐学院李幼平教授统计了25件大晟钟散存状况，除台北故宫博物院的2件外，还有北京9件，上海4件，辽宁、河南各2件，河北、陕西、湖南、山东各1件，还有海外的日本、加拿大各1件。

有一件大晟应钟编钟，不知怎的，就流落到了台州。该钟的音律在十二律中，处于正声组第十二律的位置，也就是最高音。在流传过程中，它被保护得很好，铭文未曾磨灭，纹饰依旧精工繁丽。

1951年3月，时任台州专区文物管理筹备委员会委员兼征集组组长的项士元先生，前往黄岩征集文物，历时近月，征集图书、文物一百六十余箱，计有书籍、字画、金石、瓷器、铜器等。其中就包括这枚大晟应钟编钟。

据项士元先生记录，这枚编钟为台州黄岩路桥河西(今属路桥区)人杨晨所藏。杨晨，字蓉初，晚字定甫，号月河渔隐，光绪三年(1877)进士，晚清学者、实业家、收藏家。他勤于撰述，尤留心台州掌故，曾收藏有数万册(件)古籍书画及金石珍品。

而杨晨又是从何人、何处获得这枚编钟?是在他做官所得带回台州，还是他去官返乡后在台州所得。这个问题，有待进一步考证。

1991年12月16日，经浙江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，大晟应钟编钟确定为一级文物。当下，这件北宋宫廷乐器成为临海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，受到市民、游客的喜爱。许多人在参观之余，还会购买与之相关的纪念币、帆布袋收藏。

(参考文献:《宋史》/脱脱、《浙江临海“宋·大晟应钟”及其研究》/李幼平、《见存大晟钟的考古学研究》/李幼平、《千古沧桑话大晟》/陈鹏宇)

章棫草书楹联：“最后的进士”毕生的坚定

台传媒记者林立 实习生池糖

站在一幅出自名家之手的书法作品前，人们欣赏的是什么?

书道中人，最直观的着眼点，自然是银钩铁划之间的美学。

若不懂书法，反而可以专心地做一件事——用视觉去聆听故事。

三门博物馆所藏的这对草书楹联，不算上、下款，主体十四个字，五个印章。寥寥数字，方寸之间的故事，要从120年前说起。

最后的进士

巧合出现得很突然。走到垂挂着的楹联前，三门县博物馆馆长吴元俊告诉记者：“楹联的作者名叫章棫，他是清朝光绪三十年(1904)甲辰科进士，那一年是甲辰龙年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在场所有人突然默契地对视一眼，随即笑着感叹：“今年也是甲辰龙年!”

两个甲辰年，相隔整120年，十二生肖进行了十次交替，想来令人感慨。更出人意料的是，章棫考中进士的甲辰科，是清朝最后一届科举考试，章棫也成为最后一榜进士的其中一员。

成为“最后的进士”，章棫有多骄傲呢?藏于三门县博物馆的草书楹联就有直观体现。

楹联的上联是“生平自得山川气”，下联是“晚岁犹存铁石心”。上款“敬堂仁兄大人雅正”，下款“庚辰孟夏八十叟章棫天津书寓”。章棫的骄傲，就藏在下款下方的两方印章中，一方是“臣章棫印”，另一方是“甲辰翰林”。

两方印章都是章棫的自我介绍，表达了同样的态度和情感：“我是大清朝的翰林，我永远是清朝的臣子。”

“这是章棫写于八十多岁的草书作品。这个阶段，他的书法艺术，尤其是草书可谓登峰造极，自成一派。章棫的书法作品，在清末民初就已经洛阳纸贵，尤其受到东南亚华人的追捧。这一幅草书不仅书法精湛，同时也是章棫对自己一生的精炼概括。他既是一个坚定的保皇派，同时也是一个积极推动新式教育的教育家。”吴元俊介绍道。

章棫(1861年—1949年)，名正耀，字立光，号一山，三门县海游人。海游章氏是三门的名门望族，章氏家族名人辈出。在这样自带光环的家族中，章棫仍是极为耀眼存在。

他自小聪慧，家境又富裕，6岁就进了龙山书院努力学习，但当他考中最后一科进士时，已经44岁。这37年间，他浸泡在八股经学的知识海洋中，生平对他影响至深的两位名师王棻、俞樾，在教他念书之余，不断为他加强“忠君爱国，孝悌忠信”等思想，再加上

他自小就有一个执念——为几百年没出过“翰林”的章氏拼出一个“翰林”。

可以说，他努力读书的志向，在日落西山的清朝末年，成了没有终点的单向奔赴。在种种原因的推挤之下，章棫成为一片忠心到底的清朝守护者。

宣统三年，也就是1911年2月12日，宣统皇帝溥仪宣布退位，大清覆灭。拒绝接受民国来临的章棫，开始“躲避之旅”。他先到了上海，随后又迁居青岛，用躲避的形式回应袁世凯、徐世昌两任民国总统的函电相邀。

然而，当1917年张勋实行清朝复辟时，长期沉沦的章棫精神焕发。他赶赴北京，积极参与复辟筹划。复辟短暂成行后，章棫被溥仪授予“学部左丞”一职。

昙花一现的复辟失败后，在1930年，章棫又一次因为忠心收获了荣誉。那一年章棫赶赴天津“朝觐”逊帝溥仪，君臣相见，感慨良多，章棫时年正好七十，溥仪手书“独抱冬心”四字送给这位忠臣寿礼。

冬心，一般来说都是形容在冬季孤寂凄清的心情，但溥仪在“冬心”之前加了“独抱”二字，让章棫心里涌上暖意。至此，章棫刻了一方“御赐独抱冬心”印。

这一方印章，就印在三门县博物馆所藏楹联的右上方，高高在上，独享尊崇。

但如果章棫仅仅是一个“独抱冬心”的清朝遗老，2010年三门海游街道的人们，为什么会在新修的龙山书院边上单独再建一座章一山纪念馆?

答案，仍在于“心”字。

忠心与爱心

百折不回誓要考上甲辰科进士的章棫，还有另一个身份：积极推广西方教育模式、鼓吹新学的教育家。

在如愿搭上“进士末班车”的前几年，章棫不遗余力地推进教育改革。

1900年，章棫受聘于上海澄衷蒙学堂，担任副教习，不久后任校长。提章棫此时的一个同事、一个学生，就能感知这所学堂的气质。同事叫蔡元培，学生是胡适。章棫校长在任时，积极翻译引进日本的教育管理法，介绍西方教育模式。

1901年，当章棫得知清政府将废八股为策论，改私塾为学堂后，立即写信给海游章氏族人，建议创办现代学堂。光绪二十九年(1903)春，为了加快家乡建新学堂的进程，章棫捐出了自己位于海游的房舍、田产，带头投资兴办海游学堂，定学制为10年。

这一个海游学堂，意义非凡。它是宁海、临海两地现代小学之始，绵延百余年，学校

名称变了数次，不知福泽了宁海、三门乃至周边多少地方的学子，如今仍在教书育人，是为“三门县实验小学”。

让人尤其惊讶的是，就在章棫成为翰林之后，他先后在京师大学堂、交通传习所、京师女子师范学堂等著名学府任要职。在这些新式学校里，章先生是一个锐意进取、大力改革、无一丝毫腐儒气的先进教育家。

除了对学生子毫无保留的爱，章棫对国民也展现了一个前清进士的担当。1929年，浙江台州六县水灾，章棫亲书并募捐计银元六万元赈灾。这件事就发生在他前往天津“朝觐”溥仪的前一年。

矛盾、复杂，是人们解读章棫时总结出来的评语。但站在章棫的角度，矛盾不存在，一切都是自洽的。

“生平自得山川气，晚岁犹存铁石心”一联，章棫不仅是在创作书法，更是在直抒胸臆。

上联是章棫对于自己生长于山海之畔的自豪，他认为自己坚韧不拔的气质、性格都得益于山川的滋养。下联出自苏轼一首名诗《轼以去岁春夏待立灾而秋冬之交子由相继入》，原句是“微生偶脱风波地，晚岁犹存铁石心”。

章棫深度认同苏东坡这句晚年自况，认为到老了自一片真心犹如铁石，绝不更改。在我们看来，这是一颗“愚忠”的心，而在章棫看来，这是“忠心与爱心”，他绝不变心。

章棫不仅在“家国天下”上只认旧王朝，即使在书法艺术上，他也是一个坚定的传统派。

彼时的书法圈流行“碑学”，即崇尚碑刻的书法流派，与之相对的是“帖学”，即崇尚魏晋以下书法帖子的流派。在彼时圈内人中，选择“碑学”不只是书法审美的取向，也暗含抱团依附新权威、宣示新潮流、新思想的意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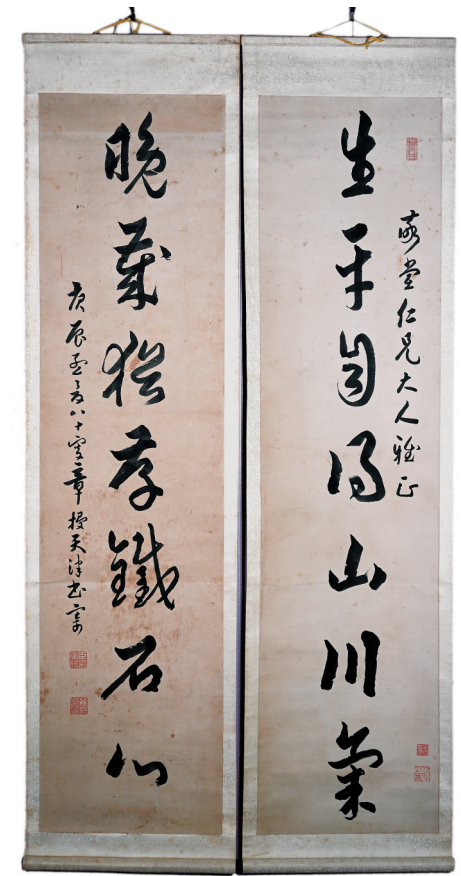
章棫的老师俞樾就是一位碑学大家，同时章棫与吴大澂、吴昌硕等碑学巨擘都是好友，他完全可以轻松成为“碑学”阵营的一员大将。但他仍然践行着“帖学”的书法审美，同时也决绝地排斥“碑学”，而是采取以二王一脉“帖学”为主兼涉“碑学”的态度。

简言之，他积极吸收新元素，但坚决捍卫旧日流派。这与他政治上坚定保皇，行动上拥护新学、新思想如出一辙。

对章棫而言，他心里想要保全的大清，是一个可以在积极变革之下变强大的国家。虽然理智上他知道不可能，但意志上他坚定，因为这是他为之奋斗的理想，和无数积极革命的新青年的理想一样坚定。

事实上，章棫确实创造了他的意义。于书法上，他成就非凡，在一片集体审美中显得卓尔不群。著名书法家沙孟海在书房里常年悬挂着章棫先生的书法对联，对其推崇备至，他评价章棫：“自唐以来千余年，学《书谱》者最具代表性的一人。”

《书谱》是初唐时期杰出书法家孙过庭



章棫草书楹联主体十四个字、五个印章 杨辉摄

的论书，是传统书法流派“帖学”仰仗的理论支柱。《书谱》也是章棫晚年的精神宝库。他的一生自清亡后可谓失意至极，然而他经常和友人说，无论得意或失意，都应该去写字。他认为：“枪炮善用之则卫人，不善用之则杀人。书画善用之可以致太平，不善用之亦足以怡情养性，断不至于丧身亡家。”

他吞下失意，自洽生活。章棫的子女与他持不同政见，他不同意子女的态度，但不干预子女的选择。他的子女，受益于章棫实行的开明家庭教育，也充分理解父亲的坚守。

章棫的子孙中，名人辈出。例如章棫的儿子章以吴与周恩来是天津南开中学同学，晚年在中央文史馆任馆员；长孙章文晋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、驻美国大使，是新中国杰出外交家。

1949年2月17日，章棫病逝于杭州勾山，享年89岁。

听完了章棫的故事，再仔细欣赏一副楹联。

这一幅字，是百余年前一个执拗的耄耋老人写下的老字。字如其人，人书俱老，但又何其年轻，何其坚定。

(参考文献:《漫谈章棫书法》/章时伦、《清末“遗民书家”章棫与沈曾植的书法交游》/吴继鸿)



北宋大晟应钟铜编钟



章棫草书楹联

扫一扫
看望潮APP

台州馆藏文物的前世今生